

任丘文史資料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丘市委员会

目 录

- 1、编者的话..... (1)
- 2、回忆我的青年时代.....杨琪良 (2)
- 3、神医扁鹊秦越人.....宗福泉 (53)
- 4、韩 婴.....顾恒敬、毛福安 (56)
- 5、吾丘寿王.....顾恒敬 (57)
- 6、张 敏.....宗福泉、马少昌 (58)
- 7、任 光.....王春江、毛福安 (61)
- 8、张 邵.....王建华 (62)
- 9、邢 颙.....顾恒敬 (64)
- 10、邢 邵.....宗福泉 (65)
- 11、邢 昺.....顾恒敬 (67)
- 12、邢 昺.....王春江 (70)
- 13、权 会.....顾恒敬 (71)
- 14、黎景熙.....顾恒敬 (72)
- 15、张 羨.....杨宝禄 (74)
- 16、张 熹.....杨宝禄 (75)
- 17、王 延.....顾恒敬 (76)
- 18、边归谿.....张 芳 (78)
- 19、邢 昺.....张 芳 (79)
- 20、麻九畴.....张 芳 (80)
- 21、李 时.....张木森 (81)
- 22、郭 乾.....顾恒敬 (82)

- 23、李 汶.....顾恒敬 (86)
- 24、田 乐.....张芳 (87)
- 25、刘元震.....李永华、刘济民 (88)
- 26、刘元霖.....顾恒敬 (90)
- 27、徐三畏.....张芳 (91)
- 28、边 永.....顾恒敬 (92)
- 29、边 鏞.....顾恒敬 (93)
- 30、边 宪.....顾恒敬 (94)
- 31、王 江.....多金柱 (95)
- 32、谢 淮.....王春江 (97)
- 33、闵 楷.....顾恒敬 (98)
- 34、闵 煦.....顾恒敬 (99)
- 35、屈 伸.....任丘市地方志
办公室 (100)
- 36、郑宗仁.....顾恒敬 (102)
- 37、明末太监杜芝恒.....王华轩、毛福安 (103)
- 38、田尔耕.....毛福安、李永华 (105)
- 39、李仪古.....王传玉 (107)
- 40、李忠简传略.....王传玉 (108)
- 41、庞 垲.....张芳 (115)
- 42、王法良.....顾恒敬、周 钰、
毛福安 (116)
- 43、刘宝钧.....任丘市地方志
办公室 (117)
- 44、刘荫榛传略.....刘坤 (118)
- 45、清末御医姚铁臣.....王传玉 (122)

- 46、王 宸传略……………潘义成 (126)
- 47、农民画家王子贤……………姜吉恒、刘佩琇、
王英才 (128)
- 48、褚桂亭……………王洪章、马树勋 (132)
- 49、王来恩……………宗福泉 (135)
- 50、高士一传略……………刘金泽 (136)
- 51、王者兰……………宗福泉 (142)
- 52、燕嘎子……………魏巍 (144)
- 53、侯太和传略……………顾恒敬 (155)
- 54、英烈少女高大正……………刘金泽、李秀琴 (157)
- 55、刘 璞传略……………黄秀贞、姜吉恒、
王英才 (159)
- 56、孤胆英雄宋子善……………李秉哲、宋子山、宋福增、
宋廉卿、韩润生 (164)
- 57、民兵战斗英雄刘进……………惠来、振华、家昌、
宗泽、耀荣 (167)
- 58、王艳芬……………任丘市地方志办公室 (171)
- 59、回忆边来僧先生……………魏子坤、王耀荣 (173)
- 60、赵崇波……………宋胜利 (180)
- 61、赵殿元传略……………宋胜利 (182)
- 62、李氏家族职官考正……………李田、李文平 (184)



杨琪良同志

回忆我的青年时代

杨琪良

一九二九年的夏天，对我个人来说，是个忧喜交加的夏天，是和我一生归宿紧密关联的夏天，它使我永生难忘。这年初，刚过了旧历年，我离别了农村，进入了保定培德中学读书，六月，接父亲来信，说是“咱读不起中学了，下半年回家种地吧……”我那位目不识丁的农民父亲，多么希望他的儿孙们能够不再受人欺凌啊！他曾经为他这个在完小读书时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的儿子，满怀希望，但这时又为他儿子读中学半年花去了三、四十元而忧愁，三、四十元大洋啊，一直上好的田地呀花去了，他忍痛决心把儿子叫回来种地。接信后，愁得我夜不能寐，茶饭难咽，怎么办？难道一生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了？这在旧中国时代是多么可怕啊！父亲三岁丧父，十三岁给地主家当小工，祖母当佣人，两代人屡受恶霸、地主欺凌欲死的悲痛情景，萦绕脑际，久久不能平息，不能啊！绝对不能！要找出路。

我打听到在保定有一家公费学校——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是六年制学校，不收学杂费和伙食费，都说非常难考，每年只招收八十名新生，而投考的人数总是一千多，有时竟达两千人左右。穷人子弟要想读书为什么这样难啊！我决心去碰碰运气，培中教育长马伦之是同乡，很同情我的处

境，但是跨校投考按校规必须挂牌开除我。书都不能读了，还怕开除吗？谢天谢地，我被录取了，任丘县这一届只被录取二人——我和边隆基。我那可怜的父亲高兴得流出了热泪，亲朋也都为我高兴！

暑假后我就是第二师范的学生了。我的同班，有个叫崔万祺的同学，住同一宿舍。此人简朴诚恳，喜交谈，家境非常困难，是他的小学老师和亲戚的经济帮助才能到保定来求学的。我们两人同病相怜相处很好，很谈得来，他常常谈到当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阶级和阶级关系以及国民党、共产党等问题，无疑，他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他经常的启蒙教育下，我逐渐对政治、对工农红军的活动发生了兴趣，经常跑图书馆去阅报，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搜寻红军和苏区活动的踪迹。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崔万祺介绍我加入了我党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通过党的地下关系，我买了几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史的一元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看不懂，很吃力，就个别的或开座谈会时向老同学们请教，一本书常是阅读四、五遍，不知请教多少次，才能略懂大意。读过两、三本后情况就好多了，兴趣也就更大了。

“研究会”的活动很活跃，常利用晚上组织座谈会，有一个作掩护的房间——伙食委员会“办公室”，我连续当了两任伙委会主任。平时则自己挤时间，找个避人的地方去阅读。“研究会”使我获益甚多，它使我从理论上初步懂得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简单道理，还懂得了一些革命常识，学会了唱国际歌，

政治兴趣更高了。马列的政治理论基础虽还很薄弱，但它对我以后的革命活动，则是非常重要的动力和资本。

就在这上半年的一天，早饭后去教室上课，蓦然看到一群同学聚在走廊里围看一张新贴出来的布告，我也凑了上去。忽然，有几位同学呼喊起来：“同学们，我们坚决反对无故开除同学！”大家也立即跟着呼喊起来，“走！去找校长去！”一大群同学把校长秦万瑞包围了起来，和他辩论，秦万瑞坚持要开除这十五名进步同学。同学们把布告撕碎了，把秦万瑞推推搡搡地关在了他的寝室里。我党掌握的学生会宣布罢课，所有教职员工、同学都不许随便走出学校。为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校内的国民党是公开的，虽很臭但还有一定势力），学生会公布组成了纠察队，要我担任了队长。纠察队共三十人，每人一根大木棒，分班轮流巡逻。这就是我组织部队时首先搞起了一个专门对付坏份子的纠察股和武装纠察队的历史来源。同时，学生会组织同学们上街游行，到省政府（住光园）请愿，要求撤换校长秦万瑞。我率领着纠察队在全校范围内昼夜巡逻；开始，精神有些紧张，深怕完不成任务，我一连三天三夜未敢睡觉。经同学们的斗争，校长被撤换了，进步势力胜利了，反动势力的阴谋失败了。经过这场斗争，使我同我校地下党的关系更进一步密切了。我先后买了十多本马列著作，坚持学习，同学们也经常借阅。在那个年代里，这些书都是违法的。曾出了这样一件怪事，有位青年竟因为买了一本古书《马氏文通》而遭逮捕。因为书名的头一个字是马克思的马字，这既可看出国民党当局是何等的愚昧无知，又可看出反动派是如何的害怕进步。这些书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啊！所以一旦听说省督学

要来查学了，立即在夜间偷偷地把书埋在大操场的地下，过后又刨出来，不知埋藏了多少次。这些书，我一直珍藏着，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们组织部队时，才被同志们传阅得不知下落了。

一九三一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日寇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象火上浇油，激起了爱国青年的无比愤怒，人们在怒吼！我校在学生会的领导下（实际上是我党在领导），首先在保定发起了示威游行。我们上街了，排着长长的队伍，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国民政府坚决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同学们被国民党当局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激怒了，“打倒胡民国”、“打倒亲日主义”的口号声震撼着经过的大街小巷。我们一连举行了多次游行，每次，都是同一个嗓音洪亮、身材高大的同学在队伍前面领着喊口号，这个人就是我，这是党给我的光荣。

每个学期都有进步同学被秘密逮捕，显然，同学中的反动分子是会告密的。国民党政府就是这样对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而对要求抗日、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下毒手。广大人民的愤怒是镇压不下去的，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这就是规律。我是我校篮球代表队的队员，爱好体育，这时，我坚决退出了校队，全力投入政治斗争。好心的体育教员、同乡朱恩奎先生曾数次劝我：“你们这样闹是要被捕杀头的啊！危险得很啊！”“还是好好地打球吧！”我没有被吓倒，相反，

倒是叫我问得他哑口无言。不搞抗日运动，不反抗日寇的侵略，靠打球能救国吗？这是个最简单的真理，有爱国心的人谁也无法反驳。这时我加入了我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我和同班同学共三个人编为一个小组，任务是：（一）搞宣传工作，在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写标语、散发和张贴组织上发下来的传单，必要时参加“飞行集会”。（二）做郊区农民工作，同贫苦农民交朋友，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条件成熟时组织“农民协会”或“贫民会”。（三）要求严格保守组织秘密，不当叛徒。还给我们每个人编了一个代号，写标语时要在后面写上自己的代号，以便组织上检查工作。保定城内西大街、城外西关、火车站等处及西郊的农田里，就成了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带，到处可以看到我们写的标语和张贴的传单①。那时入团入党必须经过这种考验。我们小组都很积极，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告密，我们的工作和小组生活会，都是严格按组织规定秘密进行的，工作时要派人掩护、放哨；开会时必须避开人们耳目，尽量减少无谓的损失，有时学校里找不到合适的地点，我们就跑到郊区的野地里去开；在生活会上，互相汇报思想、工作，交流经验，研究工作中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办法多了，我们能把党的宣传品贴在警察岗哨背后的墙上而不被发觉。当时的宣传内容主要是：反对日寇的侵华暴行；揭露国民党的卖国罪行；反对“国联考察团”庇护日寇的卑鄙丑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抗捐抗税等。

在这期间，组织上向我们讲过反对“立三盲动主义路线”问题，使我大开脑筋。现在看来，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

当时讲反对立三极左路线，而实际上执行的是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组织上也常给我们传达苏区的发展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胜利的消息，使我们深受鼓舞。

三

一九三二年四、五月间，我提出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要求，几天后，组织上派人同我进行了谈话，边谈边在一张表格上做了详细登记，还未批下来，接组织上通知：国民党河北省教育厅要撤换现任校长张腾霄，还散布说“如果学生闹事则关闭学校”等以示恐吓。组织上决定坚决反对撤换校长，我们知道，张腾霄同我党的关系是很好的，国民党政府坚决要撤换他的原因也在这里。于是，一场新的斗争开始了。

一天上午，一位身穿洋服革履的新校长来了，同学们听说来了新校长，不约而同地向学校大门方向跑去，边跑边喊：“把他赶跑！”我也急忙跑拢了去，顿时聚集了一大群同学，一齐呐喊：“反对更换校长！你赶快滚回去！”就这样，新来的校长未得进屋就被赶跑了，国民党政府来了个釜底抽薪，停发了经费，并宣布解散学校。我地下党组织决定进行护校斗争。我们游行，我们请愿，二、三十天过去了，仍毫无结果，因国民党断绝了经费供给，四百多位同学的吃饭问题成了头等的大问题，虽同学们斗志仍然很高，但这是个实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决定绝大部分同学暂时疏散回家，只留几十位同学坚持斗争。这是不得已的措施，同学们对面临着的困难是了解的。一天，组织上派共产党员边隆基向我和远宝琨同学一起传达了组织决定并要我两人暂时回家，回家后仍要设法进行工作，等候学生会的通知等。这时

麦收即将开始。回家不久，就传来了七月六日我校发生了大惨案的沉痛消息，国民党驻军包围了我校并枪杀我爱国同学，那个年月，爱国有罪啊！共有十三名同学牺牲。他们的牺牲，使我悲痛，同时更加激起我对国民党的愤怒！学潮失败了，学校被解散了^②，但革命是不会停止的，无数的革命种子散布到了各地，他们是要开花结果的。

我回家后，没有经济能力继续求学，于是当了小学教员。先是在我幼年时期的母校——大苟各庄完小任教，校长阎国华是我表兄。在这期间，我经常和同事们议论时事，有时火气上来了就怒骂国民党刮民有术救国无能等令人难忍的腐败现象和反动实质，宣传我党主张。李仲衡（后改名李丙炎）也是高年级的教员，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素怀不满，对共产党抱有希望，我俩很谈得来，人们拉他加入国民党被他拒绝，此人就是抗战后我们组织部队时我介绍加入共产党的第一个人。我还编写了一个以反抗国民党苛捐杂税为主题的话剧剧本，虽未演出，但在一部分高年级学生中传阅了。年青人总是容易暴露自己的政治色彩的。只教了半年，到了寒假期间就被我的表兄校长给辞退了，他告我：“表弟呀，你不能继续在本村任教了！”“为什么？是不行吗？”“不是！”很为难的样子。我再三催问，“唉！表弟，我实在无法，是四爷^③要我一定辞掉你，他说你是共产党，危险分子！我敢得罪他吗？”又说：“你不要着急，我一定托人给你找个教书的地方。”

就这样，我名义上当了三年小学教员，实际上没有哪一年能教到底，就被以同样理由辞退了。几年同社会的接触，使我对旧中国的社会问题有了较深的了解，也使我结识了众

多的同命运的知识青年朋友，“七·七事变”后他们纷纷投入了我党领导的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斗争。

四

我的家乡，地处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三大城市三角中心地带大清河沿岸，这里人烟稠密，交通便利，文化程度较高，农村两极分化也较严重。出过陈调元、孙连仲、韩复榘等大军阀，也出了一些几十顷地乃至上千顷地的大地主。这里的人民生性强悍，有敢于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荣传统。近代史上有名的义和团、红灯照运动，在这一带闹得热火朝天，打死了洋人传教士，烧了洋船；八国联军的铁蹄也曾蹂躏过这里，人们恨之入骨。连年的军阀混战，散兵游勇到处为害，也锻炼了人民，民间枪支很多。“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危急，亡国奴的威胁，这里的人民首当其冲。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及领导的历次爱国运动的影响深入人心，反抗日寇侵略的要求异常迫切，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极为愤懑。

芦沟桥的炮声，进一步唤醒了亿万人民。国民党数十万大军一连一、二十天日夜不停地经过我的家乡向南撤退，沿途拉人，拉牲口，拉车，抢掠财物，人民遭受了一场大灾难。

国民党大军南撤了，各县党政要人也跑了，旧政府解体了，整个冀中呈无政府状态。人们在问：“为什么这样大的中国竟打不过一个小小的日本呢？”对国民党已由失望走向绝望。怎么办？人们在焦急，在愁闷，在惶恐，心情沉重，到处在议论、在探听着捉摸不定的消息。众多的爱国知识青

年，到处在串连，在探讨救国之道，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经过一番酝酿，我和高万德二人牵头，在我的家乡大苟各庄村组织起了“抗日救国会”，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我紧紧地团结着高万德，我俩自幼同班同学，个人关系堪称莫逆，更重要的是我深知他有高度的爱国意识，对国民党当局“九·一八”后的所做所为极为不满，他也了解我的政治面目，并积极主动地靠拢我，求救救国之道，再加上他有物质手段（钱、收音机、房子等）和社会关系多。我们迅速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广泛联络任丘、雄县交界一带各村的知识青年，主要是农村小学教员和从平、津、保跑回老家的学生，小职员等，扩大抗日救国会的成员，并在周围条件较好的村庄很快建立起七、八个分会，各分会又联系着众多的群众。当时救国会的骨干分子除我和高万德外，还有高金萼，宗家佐村的宗鸿文，西八方村的李兰芳和李熙波（后者是苏庄子村人在八方村当小学教员），雄县属大龙华村的高济清，任庄子村的任工轩、李春元、娘娘宫（现名兴隆宫）村的王金钰等。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铲除汉奸等道理，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联络更多的愿抗日的同志。

我和高万德、高金萼三人，日夜在高万德家的北院一间小泥坯房里开会，收听广播。这是个堆放柴草、马粪、煤炭和一些杂用家什的闲院，倒也清静。外村的人来多了，就到本村完小去开座谈会（完小已停课），有时也打打篮球或在本村分段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道理。开始是印发传单，后出版了一个油印小报——《群声报》，向周围各村群众报道

战况，消除人们对国民党残存的某些幻想，鼓舞人们只有依靠自己救自己的觉悟。我和高万德经常各带自己的短枪，到周围各村去活动。高金萼则在那间小泥坯屋里收听广播、编辑传单、小报、刻蜡板、搞油印。我没有回过家，就和高金萼睡在这里。

大苟各庄靠大清河有一个码头区，这里一连有七、八家客店、饭馆。茶馆里经常聚集着各种的人们。这时，从北平、天津等城市逃回家乡的过往人员很多，显得比常时更为热闹，消息也较灵通。我和高万德有时晚上也到码头走走，观察行人探听消息。一天晚上，同往常一样，我们俩又来到码头，正喝着茶。忽然从船上下来了一个“卖报人”，口里不住地喊着“卖报啊！皇军打胜仗，国军又向南撤了！”立即引起了我的怀疑。

“从哪儿来啊？”我问。

“天津，先生买报吧，有大消息！”卖报人答，满口的标准天津话。

我想，天津离我村走水路二百四十里，一张小报只卖两个铜板，这果真是买卖人吗？我说：买报，跟我们到学校来吧！走了一段，这小子产生了怀疑，想跑。我和高万德两边把他一拷，拖到了村东头无人处，他承认是日寇派出来侦察大清河水路情况的。我俩把他架到水边，每人赏给了他一枪，这小子借着水势漂回天津去了。

一位到任丘县去上任的汉奸县长带着家眷、随员从天津坐船来到我村，这个家伙胳膊上带着个白箍，上写“任丘县长董”几个大字，好象怕人不知道他是汉奸似的，住在店房里了，店房的主人立即报告了我，我邀高万德到店房一看，

果然不错，正吃晚饭，炕上还放着一枝步枪和一枝盒子枪。为了不给村里人惹麻烦，我俩决定：第二天当他坐船经鄆州镇去任丘城时，在大董各庄村东北一个坟地处，船只要拐弯时打个截击，把他消灭，并商定打后立即去山西找红军，万德的妻子拿出了一百多元大洋，给我们作路费，都已准备停当。大董各庄离我村八里，万德腿拐走路有些吃力，我们赶到伏击地点时，汉奸县长乘坐的船只已驶过，没有打成④，原已准备好打死伪县长后即去山西找红军的计划也就没有实现。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组织抗日救国会，打汉奸，终非长久良策，日寇总会要来的，要能解决问题，还得向红军、苏区学习，开展武装斗争。

九月二十三日，旧历八月十九日，发生了誉满冀中的“娘娘宫⑤歼灭战”。这是一场群众自发地抗击日寇并取得了歼灭日寇小林中队九十余人的重大胜利，是冀中区第一个歼灭战。

这场战斗，是娘娘宫村我抗日救国会员王金钰打响的第一枪。这天傍晚，日寇小林中队九十余人压运木船数十只自保定方向驶向天津，船队穿过百草洼直插娘娘宫村靠了岸，三个日寇进村妄图肆虐，恰遇上王金钰，王见是日本鬼子，便掏出手枪砰砰两枪打死了一个，并立即飞跑回家上房呐喊：“来了日本鬼子了，老乡们上房开门打鬼子呀！”日寇也立即下船对该村展开了进攻，一场激战就这样打响了。激战一夜，日寇未能攻占该村，而附近二、三十个村庄成千的群众自四面八方向日寇展开了围攻，我和高万德也赶去参加了战斗。日寇伤亡惨重惊恐万状，狼奔豕突，妄图逃窜，又

到处受到群众的围攻、追击、伏击和截击。到处响起“打呀！不要让鬼子跑掉啊！”的呐喊声，使日寇胆寒。有些日寇跳入大清河中，妄图泅过对岸逃走，精于水性的群众就纵身入水与敌人展开了水战，溺毙了鬼子，缴获了枪支。至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左右，残敌逃至夏村堤弯一带，被全部歼灭。群众缴获轻机枪五挺，步枪七十余枝。九月二十七日，日寇一千二百余人自天津乘汽船十余艘，三架飞机助战，前来报复，事先我们已得到消息并号召群众坚壁清野，逃离家园暂避一时，我和高万德跑到大临河田星五家中。日寇到后，兽性大发，娘娘宫一带十八个村庄被付之一炬，上百个没有离家的群众被杀害。我俩于二十九日夜回到了苟各庄。

娘娘宫战斗的胜利和日寇的暴行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怒火和斗志，同时也使我看到了蕴藏在家乡一带人民群众中的巨大抗日力量，于是决心就地组织抗日武装。

十月，我们同河北省保属省委军事委员会主席、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孟庆山同志和军委副主席侯玉田同志（原保属特委军委主席）取得联系，高万德被委任为游击第十四支队队长，我为政治主任，便积极地开始了组建游击队的活动。这时我二十三岁，高万德大我两岁。开始，我考虑到本村地主势力还很大，深怕部队还未组织起来就被反动势力扼杀在摇篮里，高万德也怕遭到他父亲高士一的干扰破坏，所以我们就先选择在宗家佐一带搞起，我们的活动是尽量避着万德的父亲而进行的。两三个星期，我们搞起了一百多人，宗家佐的宗鸿文很努力。

没有不透风的墙，高士一见到他的儿子同我整天在一起悄悄地组织部队，且已初见成效，又听说高顺城当了游击师